

東方升起一顆明星——

2005法蘭克福書展和平獎得主帕慕克

德文譯者 ◎ 楊夢茹

全球最盛大的書展——法蘭克福書展即將於10月19日登場，今（94）年6月22日，德國書籍交易協會（Börsenverein des Detuschen Buchhandels）宣佈了2005年和平獎的得主：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

德國書籍交易協會於1950年設置和平獎，表彰德國或非德國籍在文學、學術及藝術領域上對和平思維之發展卓有貢獻之人，史懷哲、赫曼·赫塞、前捷克總統哈維爾等人都曾經獲得這份殊榮，去年摘下桂冠的，是匈牙利作家 Péter Esterházy，前年則是美國的蘇珊·桑塔（Susan Sontag）。半個多世紀以來，這是土耳其作家第二次贏得評審委員的青睞，1997年時同樣以土耳其文創作的 Yasar Kemal 首度脫穎而出，今年帕慕克步其後塵，將在10月23日於法蘭克福的保羅教堂舉行的典禮上接受表揚，頒獎典禮將由德國第二電視臺（ZDF）全程實況轉播，主辦單位並致贈25000歐元的獎金。

短短八年之間，土耳其作家兩度在法蘭克福書展綻放光芒，熟悉且持續關注這個獎項的人或許視之為平常，但對於臺灣的讀者來說，不免對這個現象感到陌生。以我們對土耳其粗淺的認識，大約知道那是一個橫跨歐亞兩洲的回教國家，近年屢叩歐盟大關云云，至於談到土耳其的歷史或文學藝術，恐怕要繳白卷了。所幸今年法蘭克福書展和平獎的得主帕慕克以獨樹一格的文風與深刻的筆觸，不但征服了歐美兩洲的讀者，臺灣的書市也已經引介了兩本他的著作：《白色城堡》、《我的名字叫紅》（麥田），真是令人喜出望外。

1952年，帕慕克誕生在伊斯坦堡一個中產家庭，原先立志當畫家，後來在大學主修建築，接著又唸了新聞研究所，曾經在紐約待了三年，自1974年開始嘗試寫作。他並非是一夕成名的作家，有七年之久寫的稿子全都進了抽屜。這番苦澀的歷練在1979年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初試啼聲之作 *Cevdet Bey ve Oğullari* 得到“Milliyet”小說首獎，1983年再下一城，贏得“Orhan Kemal”小說首獎。他不斷在文學創作的歧嶇路上披荊斬棘，至今作品被譯為35種文字，與一百多個國家的讀者相遇。完稿於1985年的歷史小說《白色城堡》讓他享譽全球，《紐約時報》的書評讚嘆：「一位新星正在東方誕生」。1990年可以說是帕慕克文學生涯的一個里程碑，《白色城堡》獲頒美國外國小說獨立獎，同年出版的《黑書》（暫譯 *Kara Kitap*）在土耳其的文學圈子引起正反兩極的反應，但受到讀者高度的歡迎，這本書並且改編為電影。1997年《新生命》（暫譯 *Yeni Hayat*）甫出版便造成轟動，成為土耳其有史以來銷售速度最快的書籍；而1998年的《我的名字叫紅》更是確立了他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五年後榮獲全球獎金最豐厚的都柏林文學獎，抱



走了100,000 歐元的獎金。新作《雪》（暫譯）2004 年入選《紐約時報》最佳外國書籍，如今，國際間最受矚目、規模最大的法蘭克福書展也肯定他的文學成就，要使他成為本屆書展最耀眼的人物。

6 月 22 日正式發布的新聞稿中，德國書籍交易協會說明這位筆耕不輟、迭有佳作的作家獲獎的理由：「沒有那一位詩人像帕慕克一樣，在東方探索西方的歷史足跡，又在西方研究東方，自覺對一種文化概念——那個全然立基於知識以及尊重他人之上的概念——負有義務。帕慕克創造了一部歐洲與伊斯蘭土耳其在書中會合的作品，他的小說《白色城堡》、《我的名字叫紅》或者《雪》，在東方敘述傳統中結合了西方現代的風格要素，所發展出來的圖像與概念，正是廣義的歐洲社會所需要的。這位作者獨一無二的記憶如此執著，潛回偉大的鄂圖曼的過往，而他果敢地支持熾熱的現在，為人權及少數族裔的人權辯護，同時再三表達關於他的國家政治問題的立場。」

從這段聲明中，我們不難嗅出主辦單位以及評審委員的選擇取向，非德語系的作家往往要有鮮明的政治傾向，而這種態度又是委員和讀者雙方都樂意見到的，才有機會殺出重圍，擊敗其他的競爭者。聲明中說的人權是回教社會中女性的命運，少數族裔的人權則指帕慕克同情在土耳其境內遭屠殺的亞美尼亞人和庫德族人。

今年 4 月，帕慕克接受《時代週報》（*Die Zeit*, 16/05）的訪問，談到新書《雪》時表示：「我厭惡透了那些偉大的思想，我被我那政治至上國家的思想狠狠地放逐了，文學就是我對政治的反應，用來嘗試扭轉這場遊戲，在這件事情上加上一點兒幽默和距離。我希望告訴讀者：別把這檔子事看得那麼嚴重，人生不美好嗎？我可不想成為我自己經常批評的乖戾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我但願透過寫作喚醒大家這種感覺，存在就是一種特許。」他又說：「我的書以今日土耳其人的內在衝突為主題，探討現代社會與伊斯蘭教之間的矛盾，渴望、卻又害怕被歐洲接受。」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批土耳其勞工湧進德國，從事修路建廠的辛苦活兒，這些人大多落地生根留了下來，形成德國社會相當突兀的一個族群。豈只土耳其申請入歐盟險阻重重，事實上，在德國境內的土耳其人屈居主流之外，正是這種夾雜著異文化與不全盤被接納尷尬處境的縮影。帕慕克自己也說，輝煌的鄂圖曼帝國沒落，在他同胞的心中種下了「粉碎性的悲傷」，以至於「健康地克服這種經歷變得不可能。……我們不一樣，我們保持著不一樣，而且我們引以為傲。」他不諱言，今日住在德國的土耳其人中清道夫及清潔婦的比例仍舊偏高，「如此一來，十六至十九世紀從近東流向伊斯坦堡的文化和物質財富不免有流失之虞。」

德國自從社民黨與綠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執政後，在這一方面倒是很用心，持續釋出和為貴、一家親的善意，無視於在野、龐大保守勢力的基民黨反對，大力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所以，綠黨的大將蘿特（Claudia Roth）在官方網站上發表賀詞，直言說道：「帕慕克是書寫城市文化及現代土耳其的新世代作家之代表，土耳其社會的對立面在他的書中有十分細膩的反映，描述傳統和摩登土耳其之間的分歧時頗有洞見。至於他針對亞美尼亞以及庫德族問題的簡潔敘述，在土國引起了激烈辯論，這並不僅表示他是位舉足輕重的作家，更證明了他嚴肅地看待土

耳其社會。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大會）決定頒獎給帕慕克都是在歌頌和平。」同樣隸屬綠黨，作風素來開明活潑的外交部長費雪（Joschka Fischer）也對德國書籍交易協會的這個決定表示贊同，稱揚帕慕克是位「傑出的作家，勇敢的知識分子以及堅定的歐洲人。」德國駐伊斯坦堡大使館、土耳其駐德使節等，喜孜孜的恭賀聲此起彼落。

走筆至此，帕慕克成為德國書籍交易協會 2005 年和平獎得主一事，政治氣氛已經掩蓋了文學原味。看來文學在這個泛政治的時代，想在桃花源裡找一塊清淨土地還真不容易呢。話說回來，文人之筆若有千鈞之勢，鋪陳故事的同時也能為被遺忘的族群或事件發聲，因此得到當局重視，未嘗不是錦上添花，又有何不可？文學而政治行得通，為政治而文學能夠這般意到筆隨、渾然天成嗎？

讓我們回歸到文學的天地。從此間已翻譯成中文的《白色城堡》、《我的名字叫紅》兩本書來看，無論題材內容、筆法及場景都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前者充滿想像力，探討身分認同及文化差異，東方與西方接觸時可能產生的火花或磨擦，地理上從義大利威尼斯橫跨至土耳其，涉及西方文學、科學與工藝，迭宕有致，是一本具有深度的好書。後者被定位為歷史小說之餘，又兼有推理小說的色彩，帕慕克在其中揮灑他博學多聞的優勢，以一具屍體的告白作為開端，抽絲剝繭敘述一則謀殺案的離奇與複雜，細密畫和鑲金畫中的繽紛，畫布下錯綜的人際關係，詭譎的人性，一一展開；書中不但描寫繪畫世界，也向生命和死亡探測，並直搗信仰及欲望的淵谷，掩卷時仍讓人驚豔不已。無獨有偶地，這兩本書的書名都以顏色為主要訴求，再看看作者其它本小說如《黑書》、《雪》等等，也不例外，似乎是他的特殊喜好，而他的表現也堪稱「用色大膽」，屢建奇功！

對中文讀者來說，踏進帕慕克用文字架設起來的殿堂時，彷彿進行一場充滿了異國情調的文學之旅，「沈浸於過往的童年時光，我任由自己的注意力在屋裡的家具和物品中漫遊。事隔十二年，我依然記得鋪在地上的藍色庫拉織錦地毯、銅製寬口水罐、咖啡壺具及拖盤、銅製大桶，以及遠從中國經由葡萄牙跋涉而來的精巧咖啡杯，已故的阿姨每每提到它們便驕傲不已，這些家庭物品，例如鑲嵌珍珠母貝的低矮 X 型閱讀桌、釘在牆上的包頭巾架、一觸摸便憶起其柔軟的紅色絲絨枕頭，都是來自阿克薩瑞的舊家，我在那間屋子裡與莎庫兒度過了童年，當年經歷的幸福繪畫歲月，仍保留在這些物品中。」（《我的名字叫紅》頁 65）這些物品，斑斕的色彩閃閃發光，甚至書中人物直斥基督徒為「異教徒」、「邪教徒」，或者一再重申對真主阿拉的忠誠等等，在在顯得理直氣壯，揭示一個我們不熟稔的世界。帕慕克筆下的這個世界並非靠著奇珍異卉勉強支撐，而是有扎實的史料作為樑柱，以深厚的藝術基礎和多變化的文筆為楫，否則，所謂的異國情調恐怕只是書頁裡飄散著一抹稍微不同的味道，卻虛弱或虛假得喚不起大眾對這個世界深層的興趣與高度的注意，何況故事還非常有趣！

帕慕克無疑是一位用功的作家，有豐沛的筆力讓他的構想搭上歷史的大船，悠遊於他的創作中，古老的鄂圖曼漸行漸近漸清晰，而當下的土耳其，即便有無法擺脫的宿命，也益覺親切。對一位以文字表現生命力和智慧的作家來說，我們還能有別的要求嗎？